

柳青研究文集

柳青百年

纪念柳青诞辰
100周年

作 埂 邢小利 董颖夫 编



西 安 出 版 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 柳青

柳青研究文集

仵埂 邢小利 董颖夫 编

西安出版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青研究文集 / 仵埂, 邢小利, 董颖夫编.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541-1428-5

I. ①柳… II. ①仵… ②邢… ③董… III. ①柳青
(1961~1978) —小说研究—文集 IV. ①I207.4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2959号

柳青研究文集

Liu Qing Yanjiu Wenji

编者: 仵埂 邢小利 董颖夫

策划: 屈炳耀 史鹏钊

责任统筹: 范婷婷

责任编辑: 张谦 王玉民

责任校对: 张爱林

装帧设计: 刘春苗

责任印制: 宋丽娟

出版: 西安出版社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话: (029)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网址: www.xacbs.com

发行: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
11401、11402室)

印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本: 710mm × 1020mm 1/16

张: 26

页: 1

字数: 320千

版次: 2016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1-1428-5

定价: 6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68206213 68206222 (传真)



柳青在写作

《柳青研究文集》资助单位
陕西省柳青文学研究会 陕西白鹿书院

《柳青研究文集》编委会

主任：邢小利 董颖夫 周延波

委员：（以姓氏笔画拼音为序）

柏 峰	柏茂义	成德奇	段建军	付合理	郭育民
贺智利	兰喜吉	刘炜评	梁向阳	齐雅丽	王作兆
王 峰	仵 埂	伍康民	徐剑铭	阎建滨	袁安生
袁安华	张志春	张耀琪	周博学		

目录

CONTENTS

辑一 史品研究

- 003 / 流派开山之作 何西来
- 020 / 被时代拘制的叙事
——论《创业史》的小说伦理问题 李建军
- 053 / 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是作家的毕生追求
——读柳青遗稿《艺术论（草稿）》 畅广元
- 062 / 革命叙事与生活叙事
——《创业史》与《白鹿原》的历史观比较 段建军
- 085 / 《创业史》与“史诗” 吴进
- 104 / 柳青早期小说分析
——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 刘宁
- 123 / 恪守与超越
——柳青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得失论 李春燕

辑二 文本研究

- 135 / 《创业史》艺术色彩漫说 费秉勋
- 148 /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农民典型
——试论《创业史》中的王二直杠 李星
- 158 / 《创业史》：复杂深厚的文本 周燕芬 杨东霞
- 168 / 乡村传统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
——论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 仵埂

- 182 / 1958年的两个小说文本
——重读柳青《狠透铁》与赵树理《锻炼锻炼》 韩鲁华
- 195 / 在革命与传统之间
——论柳青小说中两性关系 吴妍妍
- 205 / 把人物当作“人”去写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阅读手记 王云奎

辑三 “现象”研究

- 227 / 柳青一生的四个阶段
——《柳青年谱》后叙 邢小利
- 248 / “柳青现象”的文学史书写及反思 赵学勇
- 265 / 柳青与陕西作家 吴进
- 280 / 柳青研究60年的回顾与思考 刘宁
- 294 /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
——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杨辉
- 312 / 柳青为何未能写完《创业史》 董国和

辑四 作家研究

- 323 / 一位大作家的两种忠诚 阎纲
- 333 / 人之楷模 文之典范
——柳青为人与为文之于我们的启示 白烨
- 338 / 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 邢小利
- 367 / 论当代创业文学与丝路文学
——从《创业史》谈起并纪念柳青 李继凯
- 381 / 论柳青的“简朴生活”观 邵科祥
- 391 / 瞩望柳青 张志春
- 396 / 对一座文学高峰的回望与礼赞 董颖夫
- 401 / 编后记 仵坤



辑一

史品研究

流派开山之作^①

何西来

柳青的《创业史》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作者原计划写四部，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写完。第一部相对完整，初版于 1960 年。出版后，以其生活容量和艺术容量的厚重独特，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部是未完成稿，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篇幅做过了修改加工。第三、第四部未曾动笔。因此，人们对《创业史》的评价，主要以第一部为对象，一般很少涉及第二部。

读《创业史》第一部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读完本书后我受到了巨大的心灵震撼，书中人物的命运纠缠着我，使我陷入了沉思，一时兴感云集，不能自己。在奔涌的思想浪涛的推拥下，我写成了《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交《延河》发表。这是我的第一篇当代文艺批评文章，也是我迄今延续 45 年的文艺批评生涯的起点。因此，当我提笔为新版《创业史》写序时，真是感触良多。

① 本文是作者为《创业史》重印本所作的序，发表于《延河》2006 年 9 月号。（编者注）

今年寒食节的那天，我与北京和陕西的一批文友去为柳青扫墓，祭拜施仪，表达我们对这位语言艺术大师的怀念与哀思。长安区的乡党要留言，我写了“三秦师表，一代文宗”八字。这八个字，大致能反映我对柳青为人为文以及他为陕西和全国文学事业做的贡献的评价。人有生死，但只要著作行世，他就永远活着。

《创业史》是柳青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终结。正是这部作品，决定了20世纪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流作家的地位。当时的长篇小说，在文坛上有“三红一创”之说。“三红”指《红岩》（罗广斌、杨益言著）、《红日》（吴强著）、《红旗谱》（梁斌著）；“一创”则指《创业史》。四部长篇，各有特色，各见短长，但综合来看，《创业史》成就最高。因此，柳青不仅是陕西最有影响的作家，而且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创业史》是以20世纪50年代初期关中地区腹部农村的合作化为题材的作品。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统治地位，而且愈往后愈严重，致使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长期无法真正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日子。再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流毒甚广，造成了族群分裂、人人自危、相互戒备的局面。到了“文革”年代，更是农村凋敝，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农民苦不堪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广泛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本应该有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重新交还到农民手中，让农民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在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革”之后，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并以“反思文学”为最

初的契机，逐步拓展了反思的领域和深度。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高潮的反思文学，更多地侧重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话，那么，延续到21世纪初的反思潮流，则已经是视野更广的文化反思了。早在反思文学的潮流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从政治上揭示了“左”倾错误对人的心灵的残害和对人的命运的扭曲。进入学术文化领域的反思，表现在文学上，则是重写文学史，包括重写当代文学史的任务的提出与实践；还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于是，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创业史》，自然而然地会进入当代理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文化反思的视野，成为学术反思的对象。

任何一个作家，包括那些光照千秋的大师和巨匠，都不可能超离他所生存的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局限。柳青当然也不例外。站在世纪之交人们所达到的认识高度，重新评价46年前柳青初次面世的《创业史》，经以历史的阐释，实事求是地评论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指出哪些地方是柳青的贡献与优长，哪些东西具有恒久的魅力与价值，但也不回避时代的和他个人的认识所带来的局限，这无论对于仍有兴趣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还是对于柳青的研究者，都是有意义的。

在《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一文里，我一字未提《创业史》所可能有的历史局限和思想局限。一则因为我在阅读中所体验的主要是审美的满足和思想的共鸣，而对素芳命运的分析，也多半是出于对姚文元的极左非难的不满与反驳；二则因为我当时只有20岁刚出头的年纪，我的学力、阅历和思想水平都不足以支撑我具备哪怕是稍许超越柳青的眼光，何况那时柳青作为前辈作家，在我的心目中是很高、很大的；三则因为我在当时作为读者，与作者处于同一社会环境下，作者不可能完全超越那个环境，而我所受到的环境的制约只会比他更大。因此，今天在文化反思的大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创业史》，进一步论定其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就包含了对我自己那篇文章的反思与补充。由于《创业史》

处理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题材的特殊性，以及作者对这一运动所持立场的确定性，就使我们在重新评价这部作品时不能不正视其历史的局限性，而且为了便于论证其价值和意义，我们不得不先从局限性说起。

那么，《创业史》的历史局限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出现这些局限性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局限性呢？这些问题都是无法回避的。

《创业史》第一部的故事，始于1953年的春天，止于同年的冬天，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光景，以蛤蟆滩的情况而论，还属于前合作化的互助组时期。正式合作建社，建立起以梁生宝为主任的带有示范性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则是第二部的内容。第一部虽未建社，但建社的政策准备、组织准备、宣传舆论准备都已做好。就是说，蛤蟆滩作为全国农业合作化大局中的小局，在柳青笔下，建社的事已经是大势所趋，箭在弦上。但我们也看到，这场运动并非完全出于农民的自发自愿的要求，而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更加严重了，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搞完全脱离实际的“一大二公”，搞大食堂、搞大炼钢铁，搞“大跃进”，直到农业凋敝，民不聊生，灾祸频发。闹到70年代末，绵延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左”的农业路线和政策，才从根本上得到了纠正，这被称为对农民的第二次解放。历史的实践证明，“左”倾模式的农业合作化的那一套是错误的、行不通的。然而，这种错误在事情发生的当初，并没有被多数人认识到，作为当事人的农民认识不到，指导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到，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认识不到，作家也认识不到。这就是历史的局限。可以说，当时以农业合作化作为题材并加以正面描写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这方面的局限。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除了《创业史》，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都存在着这种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原因的历史的局限。这当然是很带悲剧性的。

除了题材本身或历史进程本身所带来的局限性，当然还有作家本人的局限性。包括小说在内的文艺作品，都是作家创造的产物，即使以客观描绘见长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都并不就是客观现实本身。作家的立场、倾向，都会或隐或显地投射到作品中去。柳青是一位党员作家，从《种谷记》到《铜墙铁壁》，到《创业史》，他都是自觉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写作的。他从未隐晦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对于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虽然他并不处处直接说出自己的倾向，但是通过细节，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人物彼此关系的撞击与映衬，还是不难看出作者明确的爱恨褒贬的情感态度的。正因为作者的这种党性和党的政策的明确而坚定的立场，使他不可能对当时自上而下贯彻的“左”倾路线提出异议，他没有别的选择。本来，同一题材，如果秉持不同的态度，是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的。比如以今天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去处理《创业史》的题材，做历史的、文化的反思，那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了。事实上，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不少反思性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中，也都涉及柳青《创业史》描写的那个时段的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从创作主体来说，这些作品都多少克服了柳青当年难以避免的局限，然而，在艺术上和作品的总体价值上，是否就一定超越了或高于柳青的《创业史》，其实是很难说的。因为艺术创作，特别是如柳青《创业史》这样的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色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的论定，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评估。

二

尽管《创业史》存在着题材本身所必然带来的历史局限和作家本人政治立场、政治倾向的局限，但是因为柳青在创作原则上忠实地贯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使他在艺术画卷的展示上坚持了从生活出发而

不是从既定的理念、政策条文出发的相对客观的立场。这当然在某些重要的地方，会形成与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的矛盾，而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就使得即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创业史》也仍然有其认识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了解农民，柳青把家安在西安南郊长安县的皇甫村。他不仅在县上兼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而且简直把自己变成了农民中的一员，与他们同甘苦共忧乐。因此，他对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不同性格和个性、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他关心他们的命运，包括他们的心理隐曲。因为他描写的是他所熟悉的生活，而不是无中生有地杜撰，因此，尽管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存在着历史的局限，但由于提供的是生动的、具体的生活场景，是由许多细节与形象组成的艺术画面，从而具备了一定的认识价值，使得我们能够抛开作者的政治倾向，换一个角度做出我们的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我们在前面说了，《创业史》（第一部）涉及的是前合作化时期的农村生活。土地改革完成了，蛤蟆滩的庄稼人都在谋划着奔向各自的富裕，原先的富裕户想更富裕，分田户由于劳力多少的不同，经营能力和经营智慧的差异，家底厚薄和是否遇到灾病等，出现了最初的分化。为了解决困难户、缺劳力户的耕作和口粮问题，蛤蟆滩建立了互助组，梁生宝和郭振山分别领导着两个互助联组。围绕着粮食的统购统销，蛤蟆滩富裕的庄稼人和不富裕乃至贫穷的庄稼人，态度各不相同，但是硬任务不能含糊，于是便有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应该说，柳青真实地提供了当时农村生活的情景：领导怎么想，贯彻了怎样的政策，庄稼人怎么想，作家怎样想，大家各自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都是清楚的。如果今天来写当时的蛤蟆滩，人们在价值判断和选择上，可能会与柳青在《创业史》中所提供的画面有所区别；但从根本上说，并不能证明柳青

作为参与者、过来人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及其细节就是不真实的、没有价值的。其实，就是作品中的“左”的政治氛围和“左”的政治倾向，也何尝不是当时确实存在的真实状况。即使当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当我们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创业史》所提供的现实主义的画卷，仍然具有历史的、文化的和社会学的价值与意义。

我所说的《创业史》至今仍具有的认识价值，一方面固然是柳青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艺术创作方法必然会产生追求。关于史诗效果追求，我当年在拙文《论〈创业史〉的艺术方法》中已有比较详尽的发挥，不再赘述。关于史的真实，我倒想稍做补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重史文，史家更看重秉笔直书的品格，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亦不以史家本人的好恶而枉史。柳青固然有本人的不加隐讳的好恶，但他既然追求史的品格，以史自命，以史笔自许，他就会遵从史家的书写原则，崇真尚实。何况他所贯彻的现实主义方法，其核心精神就是按生活的本来样子反映生活。按照柳青的最初设想，他是要用四部《创业史》记录一个阶段中国农民创业的历史行程的，同时也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然而，在他生存的年代，特别是他在“文革”年代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苦难中，他根本不可能最终完成这样的宏愿。他不甘心半途而废，却又不能不半途而废。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创业史》第一部只写了一年，而第二部也才写到过年的开春，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左”的政策指导思想虽说趋势已成，但毕竟蛤蟆滩还没有发展到墨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这也是柳青能够对他笔下的人物做心理上、性格上较为细致的展开的原因。而正是这种展开，才使《创业史》仍然不失为一部具有认识价值和恒久的艺术价值的重要作品。

关于《创业史》的认识价值，我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一、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并非完全出于农业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它是上级的

决定，是根据上面的政策，通过党和各级农村政权向下贯彻的；二、蛤蟆滩有相当多的人不愿搞合作社，富农姚士杰反对合作化自不必说，富裕中农郭世富、郭二老汉一家、梁大老汉和他的儿子梁生禄一家都不乐意入社，代表主任郭振山不愿入社，就是梁生宝的老爹梁三老汉，最初也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入社，再加上本身根本说不上多么富裕的孙水嘴，在蛤蟆滩自觉自愿跟着梁生宝去闹合作化的人，实际上是少数；三、土地改革时蛤蟆滩无地、少地的庄稼人刚把土地从杨大剥皮、吕二细鬼手里分回来，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做庄稼院主人的梦还没有醒来，甚至土地所有证揣在怀里还没有暖热，土地就又要入社，牲口也要合槽，他们当然不情愿、很痛苦。这实际上是一次在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政策下对劳动农民的一次新的剥夺，不仅是农民的自主经营权，而且他们的所有权，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都被剥夺了。后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农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证明了这种剥夺会造成多么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在《创业史》中，无论柳青的初衷如何、倾向如何，他都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剥夺过程在最初阶段对劳动农民的伤害，活现了他们心灵痛苦的历程。这是被作者的政治倾向遮蔽了的另一面，它也是历史，而且是存在着悲情的历史。

三

从正面谈，《创业史》也确实突出了蕴藏在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极其顽强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勤劳、节俭、强韧、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开拓进取、失败了重来、跌倒了重新站起的奔向富裕的劲头，就是这种精神的内涵。在《创业史》的《题叙》里，即在全书的序章里，柳青以极简括的笔墨、极高的概括力，突出地强调了这种精神。